

新安毕氏祖孙三代接力 刻就《十家唐诗》

安徽省图书馆珍藏明刻本《十家唐诗》见证古代出版业的“徽煌”



刻印《十家唐诗》 新安毕氏闪耀「徽派」

说到毕昇，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，他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——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。有一种说法，毕昇是北宋歙州人（后宋徽宗改为徽州）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歙县，是徽州毕氏的代表人物。

“在中国历史上，毕这个姓氏一直不是大姓，但是新安毕氏在明朝中后期却表现十分亮眼。”安徽省图书馆典藏部主任常虚怀介绍说，与毕懋谦同支平辈的毕懋康、毕懋良兄弟都是进士出身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做到了副部级高官。

“毕效钦、毕力忠、毕懋谦，刻印《十家唐诗》的毕家祖孙三代，在仕途方面就要黯淡得多了。”常虚怀说，毕效钦，字平仲，主要生活在嘉靖、隆庆年间，举人出身，官至南昌府通判。毕力忠在科举上还不如他的父亲，仅仅取得一个秀才的功名。而毕懋谦的人生轨迹，则更为平淡，如果不是继承祖辈、父辈遗志，完成未竟事业，恐怕他的名字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。

“明代徽州刻书十分繁荣，并在万历时期达到鼎盛。”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韩震军说，毕家三代接力印证这一点，这也与明代徽州世族的兴盛有关，出现了以刻书为生的家族，世代经商，且家学传承底蕴深厚，明清徽州地区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刻书家，刻印精良，“徽派”也成为出版业中的一大派别。

“从流传于后世的文献来看，毕效钦似乎很喜欢刻书，曾经刻印过《五雅》七十六卷、《江光录集》十卷，用现在时髦的话讲，可以说是致力于文化传播事业。”常虚怀表示，毕氏刻书属于典型的家刻，都是自编自校自刻，不但需要一定的财力，还需要本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学术功底。

“根据文献记载，毕效钦生前确实有过辑刻唐诗的打算，并且搜集了不少很好的本子作为底本，号称‘百家唐诗’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编排就去世了。”常虚怀介绍说，迫于生计，毕力忠才重新拾起了父亲当年未竟的刻书事业。

何以至此？“秀才身份的毕力忠花钱捐了一个杂佐官，后来做到南京东城兵马指挥。”常虚怀说，明代南北两京都设有五城兵马指挥司，分片负责京城治安，是一个正六品的边缘衙门。“在高官遍地的京城可以说十分卑微，因此捐官出身的毕力忠才得以担任这一职位”。

据乾隆《歙县志》记载，毕力忠“居官清操，不受民间一钱”，当时海瑞恰好在江宁任应天巡抚，对毕力忠颇为赏识。然而，毕力忠这样的耿介清廉却又权轻位卑的小官，在官场上无疑会举步维艰。

“明清两代给官员开的工资低得可怜，如果仅靠俸禄甚至无法维持生存，海瑞做到巡抚的高位，却可怜到生前吃不起猪肉、死后买不起棺材的地步，那么小号清官毕力忠在罢官之后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。”常虚怀说，毕力忠自己都坦言，是“田无负郭，而室若悬磬”，想回老家都没有路费，只能滞留在江宁。

毕效钦生前搜集的唐诗底本虽然不足“百家”，却也已经颇为不少，如果能从中精选出一批，刻印成书发售，或许不失为一个糊口的门道。于是，毕力忠找到同样身在江宁的同乡前辈、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的歙县岩镇人方弘静，请他帮忙做选诗的工作。之后，毕力忠又依靠不错的人缘，获得捐助，才能开始这项工作。

但是捐助毕竟有限，“乃仅仅刻数家而止”，可见哪怕是精选出来的这十家，也并未能全部刻成。几年后，毕力忠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，所谓“十家唐诗”终究未能在他手中完成，这一愿望最终要由他的儿子毕懋谦来达成。

毕力忠生前仅刻了十家当中的一部分，至毕懋谦才刻足十家。常虚怀告诉记者，根据流传于世的文献来看，毕懋谦后来大概又曾不止一次增刻此书，所收唐诗已远远不止十家，但是仍然保留了“十家唐诗”的名号。



诗圣杜甫(图来自网络)



书前的《刻十家唐诗引》



卷端为避明熹宗讳的“较”字



省图馆藏的《十家唐诗》

选本汇刻百家争鸣
诗歌流派各有风格
于前代，唐诗选本在传播媒介上也因此具有了前人所没有的优势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唐诗的选编、刊刻自然也就获得了相当良好的扩展空间。”

有明一代，文学流派众多，诗学论争持续不断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金陵诗派、前后七子、公安派、竟陵派等。“这些诗歌流派或倡复古或尚趋新，或重形式格调或主情绪性灵，但是无论何种诗派、何种主张，他们所效法的对象都是唐诗。”他认为，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，明代唐诗选本非常繁荣，几乎所有的诗派都以选本的形式来阐扬自己的诗学主张，标立自己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学习的样本，唐诗选本成为人们张扬己见、攻击异端的重要武器。

“这样，明代唐诗的选编、刊刻与明代的诗学论争产生紧密的关联，相互之间互为因果，相互刺激、生发，既促进了明代诗论的发达，也同时提高了唐诗选编的数量和诗学品质。”韩震军表示。

通讯员 葛小禾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武鹏 王素英 文/摄 周继龙/制图



诗仙李白(图来自网络)